

试论唐代市舶使的职能及其任职特点

宁志新

市舶使,是唐代始设的管理海外贸易的官员之一,且为以后的宋、元、明三代所长期沿用。因此,深入探讨唐代市舶使的职能变化及其任职特点,是十分必要的。本文试就这两个问题略抒管见,敬请方家教正。

(一)

唐代市舶使于开元初年已经设置。《旧唐书》卷8《玄宗上》云:

(开元二年十二月) 时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,与波斯僧广造奇巧,将以进内。监选使、殿中侍御史柳泽上书谏,上嘉纳之。

这是笔者所见关于市舶使问题的最早记载,可见市舶使最迟于开元二年(714)已经设置。不过,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的《唐六典》却不见记载,五代时成书的《旧唐书》及北宋时成书的《新唐书》中职官(百官)志部分亦不见记载,因此,关于唐代市舶使的职能问题只能依据其他史料记载加以推定了。

笔者所见较全面记述唐代市舶使职能的史料有两条,一为李肇撰《唐国史补》卷下“狮子国海舶”条云:

南海舶,外国船也。每岁至安南、广州。师子国舶最大,梯而上下数丈,皆积宝货。至则本道奏报,郡邑为之喧阗。有蕃长为主领,市舶使籍其名物,纳舶脚,禁珍异,蕃商有以斯诈入牢狱者。

二为《全唐文》卷75载唐文宗《太和八年疾愈德音》云:

南海蕃舶,本以蕃化而来,固在接以恩仁,使其感悦。如闻比年长吏,多务征求,嗟怨之声,达于殊俗。况朕方宝勤俭,岂爱遐琛,深虑远人未安,率税犹重,思有矜恤,以示绥怀。其岭南、福建及扬州蕃客,宜委节度,观察使常加存问,除舶脚、收市、进奉外,任其往来通流,自为交易,不得重加率税。

综合该两条史料,可以看出唐代市舶使的职能主要有四项:(一)纳舶脚,即征收外国商舶下碇税;(二)收市,即征收商税;(三)进奉,即向宫廷进献海舶载来之珍宝香料等物;(四)禁珍异,即检查外船有无违禁之珍奇异物。但如果以此而认定唐代市舶使一开始设置就完全具备这些职能,好就不符合历史实际了。

其实,唐代市舶使设置之初,只不过是一个拱手监临地方官向宫廷进奉海外珍品的督察官而已。《全唐文》卷515载王虔休《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》云:

……伏以承前虽有命使之名,而无责成之实,但拱手监临大略而已,素无簿书,不恒其所。自臣亲承圣旨,革划前弊,御府珍贵,归臣有司,则郡国之外,职臣所理,敢回天造,出臣匪躬。近得海阳旧馆,前临广江,……辨其名物,陆海珍藏,……穷祥极瑞,知天子万方之司存。今年波斯,古逻本国二舶顺风而至,亦云诸蕃君长,远慕望风,宝舶荐臻,倍于恒数。臣奉宣皇化,临而存之,除供进备物之外,并任蕃商列肆而市。交通夷夏,富庶于人,公私之间,一无所阙。……

此表是王虔休在将“海阳旧馆”改建成“市舶使院”之后而给皇帝的上奏。按王虔休,两《唐书》有传,但均无其出任过广州市舶使之记载。不过,从该表全文看,他是“亲承圣旨”,而到岭南广州去主持市舶事务的,上任后即“革划前弊”,对市舶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,建立了市舶使院,可见其曾充任舶使一职,当无可怀疑。

关于该表中提到的“海阳旧馆”,陈裕青先生认为“海阳”系指潮州,此表则为唐代潮州与外国有过贸易往来的“绝好材料”,还认为“蕃商至列肆而市,其地互市不冷淡可知”。^①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。按该表全名为“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”,则“海阳旧馆”似原应为一“王馆”,但细考唐代诸王,并无“海阳王”之名,是否有异姓于(非李唐王室)受封为“海阳王”呢,又难于查考,故此说暂可存疑。退一步讲,即使“海阳”确为县名,即今日之潮州,“海阳旧馆”也不可能建在潮州,而应该位于广州。因为王虔休时为广州市舶使,他是绝不可能将市舶使院(市舶使的办公场所)选定在距广州远达数百里之外的潮州的。合理的解释只能是:若“海阳”确指潮州,则“海阳旧馆”应是海阳(潮州)设在广州的办事处,正象当时各道在京城设立的进奏院一样。以上分析表明,该表不足以作为唐代潮州有过海外贸易之事的史料根据。

关于该表的上奏时间,是必须考证清楚的。据两《唐书》《王虔休传》,王虔休于大历(766—779)年中为本州(汝州)刺史李深署为裨将;后为泽潞节度使李抱真招为部将,累授兵马使押衙。建中二年(781),李抱真统兵马征讨河北,王虔休颇有战功,擢为步军都虞候,累加兼御史中丞、大夫。贞元十年(794),李抱真死,王虔休升任昭义节度留后;十一年,又正式担任节度使;十五年,死于任上。^②据此可知,在建中二年(781)之前,王虔休只是泽潞节度使李抱真的部将,根本不为朝廷所知,不大可能派他充任广州市舶使;到了贞元十年(794),王虔休升任昭义节度留后,不久又晋升节度使,地位远在市舶使之上,也不可能到岭南去充任广州市舶使。而从建中二年(781)到贞元十年(794)之间,王虔休兼任御史中丞、大夫,已为朝廷所知,故他充当广州市舶使的时间只能在此期间之内。也就是说,王虔休呈献“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”的时间应在建中二年至贞元十年之间,即德宗朝前期。

若上说不误,则我们就可以看出唐代市舶使职能的大致变化情况。在德宗初年之前,正如

王虔休上表所云：市舶使“虽有命使之名，而无责成之实，但拱手监临大略而已，素无簿书，不恒其所。”可见当时的市舶使只起督促地方官吏进奉的作用，而其本身则一无记帐文簿，二无固定的办公场所，根本谈不上去管理海外贸易了。而到德宗初年，王虔休担任广州市舶使，“革划前弊”，使“御府珍贵，归臣有司”，即将进奉之事直接掌于市舶使之手，并建立了文簿档案；又选定海阳旧馆为市舶使院，使市舶使有了固定的官府衙门，可以独立地行使职权；还对波斯等国来的船舶“临而存之，除供进备物之外，并任蕃商列肆而市”，从而使市舶使真正成为管理海外贸易的官员。也就是说，经王虔休改革之后，唐代的市舶制度才逐步完善起来，市舶使的各项职能，如进奉、征税、禁珍异等等，才最终确定下来。

王虔休对市舶制度的改革与市舶使职能的变化，并不是偶然发生的，而是与唐朝的整个历史进程紧密相联的。

唐朝自建立之日起至开元时期，一直沿袭隋朝旧制，不征收关市之税。正如《唐六典》卷6《尚书刑部》云：

凡关，二十有六，……所以限中外，隔华夷，设险作固，闲邪正暴者也。凡关，呵而不征，司货贿之出入，其犯禁者，举其货罚其人。

这里明文规定了设关的目的，是为了“限中外，隔华夷”，“司货贿之出入”，查禁违犯者；而不是为了征税，即“呵而不征”。虽然这里指的是陆路关卡，但肯定海关也不会例外。按《唐六典》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，而市舶使早于开元二年就已经设置，可见市舶使设置之初并无征收关税之职能。

这是市易之税，唐朝初年也不见征收。武则天时期，倒是有人提出过要征收关市之税。如当时历任益州长史、中台左丞、兵部侍部的张知泰就“奏置东都关十七所，讥敛收入”，结果造成“百姓惊骇，樵米踊贵”，未及推行，即“卒罢不用”。^③长安三年（703），有司又“表税关市”，其事条中规定：“不限工商，但是行人尽税”，“不论商人，通取诸色”，“江津河口，置铺纳税”，结果为凤阁舍人、兼修国史崔融谏阻。^④

唐代明确记载征收市易之税的时间是天宝九载（750），《唐会要》卷66《太府寺》云：

天宝九载二月十四日敕：“自今以后，面皆以三年四两为斗，盐并勒斗量。其车轴长七尺二寸。除陌钱每贯二十六。余面等同。”

这里所说的“除陌钱”，即指市易之税；每贯二十文，即税率为2%。既然到天宝九载才正式规定市易税的征收方法，那么早于开元二年就已经出现的市舶使，其设置之初肯定亦无征收市易之税（即“收市”）的职能。

安史之乱以后，唐朝国力大损，加之随后出现的藩镇割据局面和朝廷一再发动的平叛战争，更使得中央财政日益困难。为了摆脱财政危机，维系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，唐王朝不得不想方设法扩大财源，于是各种杂税纷纷出笼。《通典》卷11《食货十一·杂税》云：

自天宝末年，盗贼奔突，克复之后，府库一空，又所在屯师，用度不足，于是遣御

史康云间出江淮,陶锐往蜀汉,豪商富户,皆籍其家资,所有财货畜产,或五分纳一,谓之率货,所收巨万计,盖权时之宜。共后诸道节度使、观察使,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,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间交易之处,计钱至一千以上,皆以分数税之。……上元中,初江淮堰塘商旅牵路过处,准斛纳钱,谓之埭程。

这里所说的“率化”,显然不是商税,而是官府对豪商富户的一种强制性摊派。其余各项,则皆属商税(流通税或营业税)范畴。此外,乾元元年(758),东京留守、东畿采访等使李巨“于城市桥梁税出入车牛等钱以供国用”,^⑧广德(763—764)初年,淮西节度使李忠臣“设防戍以税商贾”,^⑨均为当时各地自征商税的典型例证。

建中元年(780),宰相杨炎奏行两税法,规定“不居处而行商者,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”,^⑩从而交商税正式纳入国家财政。商税的征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,盐、酒、曲、矿冶等税是其中的大宗。贞元九年(793)正月,又“初税茶”,“每十税一”。^⑪在这种大背景之下,向外国商人征收商税,以扩大国家税源,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。也正是在这个时期,唐德宗派遣王虔休出任广州市舶使,大力改革市舶制度,最终使市舶使具备进奉、收税及禁珍异等多项职能,真正成为管理海外贸易的主要官员。

综合上述,我们可以看出,市舶使的职能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充实、完善的,并非一开始就具备后来的各项职能,这是我们考察唐朝市舶制度时必须予以充分注意的。

(二)

市舶使虽是唐朝始置的管理海外贸易的主要官员,但唐代典籍却对之记载甚少。据笔者所见,唐代担任过市舶使的有案可查的只有三人:

一为开元二年(714)出任安南市舶使的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,前引《旧唐书》卷8《玄宗上》之记载即为明证。此外,《新唐书》卷112《柳泽传》、《册府元龟》卷546《谏诤部·直谏》亦有相同记载。《唐会要》卷62《御史台下·谏诤》称:“岭南市舶司、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”,当误。

二为广德元年(763)出任广州市舶使的宦官吕太一。《新唐书》卷6《代宗纪》云:“(广德元年)十一月壬寅,广州市舶使吕太一反,逐其节度使张休”,即为明证。此外,《旧唐书》卷11《代宗纪》、《资治通鉴》卷233. 广德元年十一月条亦有相同记载。

三为唐德宗初年的王虔休,前引《全唐文》卷515所载王虔休《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》即为明证。据前文考证,他是由泽潞节度使下属的步军都虞候兼御史中丞(或御史大夫)出任广州市舶使的。

显然,仅仅根据以上三人来探讨唐代市舶使的任职情况和任职特点,是远远不够的,还必须深入挖掘唐代的其他有关记载。

关于安南市舶使的任职情况,《陆宣公集》郑18《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》中亦有涉及,该论状云:

岭南节度经略使奏:近日舶船多往安南市易,进奉事大,实惧阙供,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,望定一中使与臣使司同勾当,庶免隐欺,希颜奉宣。依者,远国商贩,唯利是求,绥之斯来,扰之则去。广州地当要会,俗号殷繁,交易之徒,素所奔凑。今

忽舍近而趋远,弃中而就偏,若非侵刻过深,则必招怀失所。……且岭南、安南莫非王土,中使、外使悉是王臣。……岂必信岭南而绝安南,重中使以轻外使,……望押不出。

《资治通鉴》载其事于德宗贞元八年(792)六月,并在援引岭南节度使的上奏之后写道:“上欲从之”;而在援引岭南节度使的上奏之后写道:“上欲从之,而在援引上述陆贽的议论之后却未载德宗的态度。论状中提到的“中使”,是指由宦官担任的市舶使,即“市舶中使”;“外使”,是指由朝官担任的市舶使,时指由岭南节度使派往安南“收市”的判官。该论状名为“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”,说明在此之前,即贞元八年之前,出任过安南市舶使的全是朝官,而不是宦官。至于贞元八年之后的情况,因为史籍未载德宗的态度,所以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:一是如果德宗批准了岭南节度使经略使的奏请,则安南就会出现两个市舶使,一个是由岭南节度使经略使派遣去的由朝官(判官)担任的市舶使,另一个是由朝廷派遣去的由宦官担任的市舶中使;二是如果德宗采纳了陆贽的建议,则就不会向安南派遣市舶中使,即那里的市舶使仍由朝官担任。因此,可以认为,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是安南市舶使任职情况的典型例证。当然,安南市舶使是不常设的,只有海外船舶开到安南时才临时设置,陆贽的论状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。

关于广州市舶使的任职情况,另可见《旧唐书》卷98《卢怀慎传附子奐传》。该传云:

天宝初,……乃特授奐为南海太守,遐方之地,贪吏敛迹,人用安之。以为自开元已来四十年,广府节度清白者有四:谓宋璟、裴奂先、李朝隐及奐。中使市舶,亦不干法。

这里所说的“中使市舶”,是指由中官(宦官)为使主持市舶事务之意,亦可认为是“市舶中使”的别称。该文所称“中使市舶,亦不干法”,是指“自开元已来四十年”,宋璟、裴奂先、李朝隐、卢奐等四人任职广府时的情况,可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广州市舶使是由宦官充任的。广德元年(763),宦官吕太一为广州市舶使,就是这一惯例的典型例证。即使到唐朝后期,宦官领市舶使的情况仍然存在,如开成元年(836),卢钧任岭南节度使,他“性仁恕,为政廉洁,请监军(宦官)领市舶使,己一不干预”。^⑩由此又可以看出,广州市舶使是经常设置的,这与安南市舶使的设置情况大相径庭。

当然,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广州市舶使是由宦官充任的,并不意味着朝官就一个也没有,前举王虔休就是朝官充任广州市舶使的典型例证。不过,这已是德宗初年以后的事情了。

综上所述,我们可以归纳出唐代市舶使的设置与任职情况的几个特点:

第一,唐代只在安南(交州)、广州二地设置有市舶使,其余扬州、泉州等地虽也有外贸活动,但均无市舶使之设。

第二,安南市舶使是临时设置的,其职多由朝官充任。从德宗贞元八年(792)之后,也可能有宦官担任的情况,即有可能向安南派遣市舶中使。

第三,广州市舶使是经常设置的,其职多由宦官充任。从德宗初年之后,也有由朝官担任的情况,王虔休即为明证。

唐代市舶使的任职情况为什么会呈现这些特点呢?笔者以为,这主要是为唐代设置市舶使

的目的与市舶使的职能所决定的。

如前所述,唐代始置市舶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进奉海外珍品,以满足宫廷对珠宝香料等奢侈品的需求。到唐德宗初年王虔休改革市舶制度之后,市舶使才真正具备了进奉、征税、禁珍异等多项职能。然而在这些职能中,摆在首位的仍是“进奉”。前引陆贽《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》中援引岭南节度经略使奏称“进奉事大,实惧阙供”一语,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王虔休《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》中所称“臣奉宣皇化,临而存之,除供进备物之外,并任蕃商列肆而市”,也说明了这一点。

当时的海外商舶来华,正如前引《唐国史补》所云,总是驶向安南、广州二地。因此,只要在该二地设置市舶使,就可以将宫廷所需的海外珍品全部备齐。以后这些舶来品不论运往何地销售,宫廷都不再需要它们了,于是那些地方也就无需再设置市舶使了。唐代只在广州、安南二地设置市舶使,而不在扬州、泉州等地同样设置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此。

就广州、安南二地而言,驶向广州的商舶要比驶向安南的多得多。因此,滞留广州的外商特别多,以至连当时的阿拉伯商人阿布·赛义德·哈桑也称广州为“阿拉伯商人荟萃之地”,^⑨可见那里的外贸活动异常频繁,常年不断。相比之下,安南就逊色多了。这正是广州的市舶使经常设置,而安南的市舶使临时设置的根本原因。

也正因为驶向广州的外国海舶及外商人数特别多,所以宫廷的海外珍品自然主要仰赖广州进奉,于是广州的市舶使才多选专门代表宫廷外出购物的宦官担任。到德宗初年为扭转财政危机而多方扩大税源时,才选派朝官王虔休出任广州市舶使,以大力改革市舶制度,于是才开朝官充任广州市舶使之先例。面安南(交州)位偏道远,外贸活动远不如广州发达,宫廷对其依赖性很小,故那里的市舶使一般由朝官担任。只是到了“近日船舶多往安南市易”,岭南节度经略使深感“进奉事大,实惧阙供”时,才奏请皇帝向安南加派市舶中使的。由此可见,正是由于唐代市舶使的主要职能仍为“进奉”,所以才会出现其任职情况的上述那些特点。

(作者宁志新,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,河北师院历史系副教授。)

注释:

① 桑原鹭藏著、陈裕青译《藩寿庚考》第22页,中华书局1954年11月版。

② 《旧唐书》卷13《德宗下》。

③ 《新唐书》卷100《张知寿传》。

④ 《旧唐书》卷100《张知寿传》。

⑤ 《旧唐书》卷112《李巨传》。

⑥ 《旧唐书》卷155《穆宁传》。

⑦ 《唐会要》卷83《租税上》。

⑧ 《旧唐书》卷49《食货志下》。

⑨ 《旧唐书》卷177《卢钧传》。

⑩ 《中国印度见闻录》卷2,第115页,中华书局1983年版。